

数字时代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新认识、新命题和新路径*



侯怀银¹ 王钰捷²

- (1. 山西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山西太原 030006;
2. 山西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 山西太原 030006)

摘要: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与算法技术的迅速发展, 知识生产正逐步进入一个以人机共生、数据驱动为核心, 多模态交互为特征的数字时代。这给知识生产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影响着教育学的理论和实践两条主动脉, 表现为主体间性的人机交往范式正重塑生命的表征形态、信息的碎片化在不断消解人的整体性、数字技术在教育生态系统的深度嵌入带来价值隐忧。基于此, 文章提出了数字时代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新命题, 包括以自主性为导向的本体转向、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张力中凸显中国立场、“物理-精神-虚拟”三重空间交织下重塑知识境域。为此, 数字时代在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 知识生产者要做好数字资源的提供者、数字技术的使用者、数字技术的控制者, 通过构建集体智能系统推动教育数字资源有效供给、发挥主体能动性增强人机协同知识生产效能、健全技术治理机制保障知识生产质量。

关键词: 数字时代; 中国教育学; 知识生产; 自主知识体系; 人机共生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 (2025) 07—0005—09 【DOI】10.3969/j.issn.1009-8097.2025.07.001

当今, 世界正处于文字与数字深度交融的历史转折点。在这一进程中, 大模型通过向量计算试图将一切事物量化, 不仅以数字方式重新表征现实, 也逐步将人类由物理世界带入一个嵌套于算法与数据之中的“数字现实”。继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之后, 数字正迅速成为推动社会生产的第四要素。与此同时, 机器的外延也随之从工厂生产领域扩展渗透于人类的整个社会生活之中, 推动了工业文明向智能社会的转型。人工智能作为新的技术形态不仅发挥了工具的作用, 更在潜移默化中重塑着我们对世界、社会与人的理解和认识。在此背景下, 研究者围绕教育实践的数字化、智能化变革形成了大量的成果, 但对于教育研究尤其是教育学知识、理论建构的研究涉及较少。教育学作为一门紧密关联知识生产与人类发展的问题导向型学科, 面对数字时代新兴技术的变革与冲击, 亦需要进行深刻的范式转换, 这也将影响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已有研究者围绕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教育学知识生产产生的功用^[1]、新境况^[2]、影响及应对措施^[3]展开了研究, 这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启示。此外, 也有研究者立足于技术乐观的视角对数智时代自主知识创新的基本逻辑和实践路径展开研究,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4]。数字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扩展了人类认知的界限, 在大量知识涌现的同时, 也在不断侵蚀着人的主体性与判断力。因此, 我们需辩证地审视数字时代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既要回应技术发展的现实诉求, 又要坚守人文精神的底线, 从而避免陷入“普罗米修斯式羞愧”之中。

一 数字时代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新认识

数字技术带来了知识生产主体、知识生产方式、知识内容构成、知识传播方式的深度变革: 促使知识生产主体愈发多元, 推进不同主体情境间教育知识或信息的交流、交融与交锋; 推动知识生产方式从知识生产模式 1、模式 2 到模式 3 的转变; 在知识内容构成上, 呈现出从“硬”知识向“软”知识、“灰”知

识、“暗”知识等多元化知识类型转化的趋势^[5]；形成多模态融合的传播方式，信息的标签化使知识传播的精准度与效率提升，推动传播向个性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其中视频与图像所具有的“可意象性”，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隐性知识和元理论知识的形成^[6]。但数字技术除了产生诸多“福利”之外，也带来了人的主体性和整体性的流逝以及价值危机，这些构成了教育学知识体系得以建构的现实前提。

1 主体间性的人机交往范式正重塑生命的表征形态

“眼见不一定为实，构建事实的基础材料在逐渐失去效力；说者不一定为人，人际互动与人机互动在逐渐失去界限。”^[7]数字化推动了“后人类视角”的兴起，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使机器的“类主体性”不断凸显，知识生产不再仅依赖于个体研究者的理性推演与经验归纳，人类进入一个与智能机器共存的“共智时代”，传统的主客二分的交往范式转向主体间性的人机交往范式，人-机关系进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新阶段。人工智能的发展路径经历了对人脑思维的功能模拟、结构模拟和行为模拟三个阶段，其技术基础也由早期的逻辑推理系统转向以神经网络为核心的深度学习机制，在该机制下人工智能根据人类的输入指令与语言符号来理解并模仿人类语言，通过不断反馈优化语言模型从而习得人类语言。以 ChatGPT 和 Deepseek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诞生与迅速发展，标志着智能机器已从被动执行人类指令的工具，转变为具备自然语言交互能力且可生成文本、图像乃至逻辑结构的“类主体性”存在，成为人类认知活动中的重要协同主体。这一发展为知识生产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促使以数据为核心、以人机协同为方式的数据中心化知识生产范式日益占据重要地位^[8]。

数字技术发展不断解构人独有的生命属性，使数据主导的算法逻辑逐渐建立起来。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一书中提出了“话语构型”这一概念，旨在通过话语再现物的秩序，从而帮助人类认识和理解世界，在这一过程中，话语作为中介隐含了一套筛选与过滤机制，构建了一种话语的秩序。到了数字时代，这一机制被进一步放大与深化，通过数据收集和自动算法，正在形成一种算法秩序，架构了“词-物-数据”三元对应关系^[9]，具体表现为：其一，算法逻辑旨在将一切事物转化为数据或元素，记录储存至处理器中，人也变成了被数据分析和描述的“物”，在数据化、档案化的过程中面临着去质化风险，人与人之间最特殊的差异性存在被客观量化数据抹去，人类的许多高级智能被大数据和算法所取代，不同领域的知识被视为数据流的不同模式^[10]。其二，计算机的黑箱属性使人在这一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即人只能接触到算法所输出的结果，而无法掌控其内部的运行逻辑与形成机制。其三，随着数字生命秩序逐渐建立，未来可能会诞生由生物体与机器组成的混合智能杂合体。在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的影响下，信息实现了与语境、意义以及信息载体的分离，改变了依靠肉体定义生命的方式，由此诞生了以数据形式存在于虚拟空间中的数字生命形态^[11]。正如 Ellul^[12]所言：技术自身具有自我增长的特性，其演进速度正逐渐超出人类的掌控，未来或将出现类似科幻作品中呈现的赛博格式新型生命体。

2 信息的碎片化在不断消解人的整体性

数字时代不仅深刻变革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也对人的认知结构与认知方式进行了根本性的重构。自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以来，现代研究型大学逐渐确立了其作为知识机构的核心地位，成为承担系统性知识生产任务的主要载体。在这一范式下，知识生产不仅高度依赖于大学制度的组织逻辑和资源配置机制，也被建构为学术共同体内部尤其是精英知识分子群体的专业特权。教育学领域存在一种层级型认识论，主体间存在单向的制约，主客体关系界限严明，理性能力备受推崇，这使知识的产生、判断、传播成为教育精英的专属任务^[13]。教育学知识的形成亦多以学科为基本单元^[14]，遵循“专家主导-文本生产-同行评审”的线性模式展开，其理论体系和方法论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学术传统的深刻影响。

数字时代打破了精英式的单一知识生产主体和传播模式，并逐渐向多元协同方向发展。人工智能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使其以高度的便捷性与可及性为多主体参与知识生产与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持，在扩充人的认知边界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解构人的整体性：其一，主体的多元扩充使大量的知识涌现，也带来了知识质量难以控制的问题。知识在高速流通的过程中被不断肢解，呈现碎片化，其逻辑性和系统性被破坏。接受者也因自身掌握的片段式知识，导致较难形成关于教育世界的全面、客观的整体性认识。其二，在“短小精悍”的图像与视频知识的长期投喂下，知识生产者的认知与表达逐渐扁平化，表现为知识生产者越来越倾向于使用简洁、形象的语言进行表达。这不仅削弱了其对复杂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与综合分析的能力，也动摇了新知识诞生所依赖的认知与语言基础。其三，斯蒂格勒将存储记忆视为一切推理与判断得以展开的基础，认为记忆是知识的原型^[15]。然而，技术凭借其在信息储存容量和提取速度方面的绝对优势，正不断削弱人类对自主记忆与知识积累的依赖，这将导致人类认知能力的外包和思维深度的浅化，进而引发复制性知识替代原创性知识的危机。

3 数字技术在教育生态系统的深度嵌入带来价值隐忧

在数字技术高度嵌入的当代社会，以大数据为基础的信息媒介已深刻渗透人类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数字技术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深度嵌入，使教育生态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带来了课堂模式、教学方式、学习方式和师生关系等的巨大转变，并扩大了教育学的范畴和边界。数字技术作为基础性媒介不仅是信息传播的工具，更是知识构造的场域，这为教育领域的其他相关主体参与教育学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可能。数字媒介作为一个庞大的数字档案库，通过持续将教育活动中各类参与者的行为与反应进行数据化、档案化和模型化，成为现实世界的镜像。在这一过程中，学生、教师、研究者等各类教育主体在使用数字媒介的同时，也不断生成教育数据，从而扩展了教育学知识的来源和基础，并以多维度、多时间尺度的形式间接参与到教育知识的生产与重构中。

教育不仅是知识传递的过程，更是价值培养与人格生成的重要场域，而数字技术本身因情感和伦理等价值属性的缺失所引发的隐忧日益凸显。“尽管生成式 AI 在语言和创意表达方面已展现出强大的功能性，但它仍缺乏人类在情感体验、价值观与伦理边界形成、社会认同等方面的独特性。”^[16]由于机器本质上不具备自我意识与情感感知，教育者和学习者在数字环境中被简化为网络中的“行动元”，人的感性体验、感知能力及其内在的情感世界是无法通过数字编码彻底还原和传递的，这也决定了纯技术手段无法承载教育过程中情感与价值生成的核心任务，失去了原本丰富而复杂的主体性。教育本质上强调“以爱唤醒爱”的主体价值，这意味着教育不仅是知识传递的过程，更是一种基于主体间的情感共振与价值生成的深层次人际交往过程。唯有在教师与学生相互理解、回应和建构意义的过程中，才能生成新的知识场域，推动个体人格的完整发展。

然而，人工智能技术所固有的情境抽离特性及其背后的数字理性逻辑，正在加剧工具理性的主导地位，使教育活动中的感性世界与理性世界日益分离。教师逐渐从拥有自主创造力和情感回应能力的主体，异化为功能性、程序化的他者角色，其社会结构中独特的伦理与人文价值被系统性忽视，教育的人文属性与人的全面发展目标也因此遭到削弱。在此背景下，亟需对数字技术在教育中的深度应用保持必要的批判性反思，强调教育的人文维度和情感基础，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二 数字时代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新命题

面对数字技术对人的主体性、整体性、价值性的冲击，并结合中国教育学知识体系建构中存在的既有

问题，我们需要对中国教育学知识体系进行反思性建构。立足“自主与主体”“世界与中国”“物质世界-虚拟世界-精神世界”三个方面，本研究提出数字时代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新命题。

1 以自主性为导向的本体转向

“自主性是主体性的核心内涵，也是必要条件，而具备主体性，才具备了参与平等交往的条件。”^[17]在数字时代背景下，构建中国教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以“重建主体性”为核心导向。当前语境下，主体性的内涵得到了多重扩展，不仅指向中国教育学相对于西方教育学传统的理论自主性，还涉及数字技术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介入知识生产过程之后人类个体相对于技术系统的思维自主性，以及国家在国际学术场域中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上的自主性。

第一，中国教育学期长期对西方教育学范式的依赖，是其诞生之始一直存在至今的老问题。自20世纪初教育学在中国诞生以来，如何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框架，实现本土经验的理论化、学术语言的自主化，一直是学界不懈追寻的方向。近年来，“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上升为国家战略，为教育学者建设理论自主性提供了制度支持与历史机遇。第二，“人类理性特有的主体性和自主性，是人与机器的本质区别。”^[18]在数字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不断嵌入教育研究与实践的情境中，教育学的主体性还面临着来自技术理性过度膨胀的现实挑战。随着技术工具的广泛可及化与高度智能化，其无声无息地介入并贯穿于人的整个生命历程。在此背景下，教育研究者更需警惕陷入“技术拜物教”的迷思，避免丧失独立思考与批判的能力。因而，保持主体性意味着必须保持对技术本质的清醒认知，大数据并不是全知全能，应强调人的思维能动性价值判断，避免技术逻辑对教育逻辑的“殖民”。第三，数字技术并不是价值中立的，其本身嵌入了特定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和政治意识形态。“技术不仅是一种效率增益的工具，还折射出人类世界的价值取向与社会关系更深层的内在规定，表征了部分社会属性。”^[19]人工智能所依赖的数据资源、技术平台及模型架构，在很大程度上被特定的资本权力结构与意识形态系统所规训和塑形。从数字基础设施到平台算法，从知识推荐机制到数据治理标准，技术背后潜藏着话语权的较量。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在表面的去中心化与民主化背后，可能潜藏着更深层次的价值导向与文化控制。对于作为国家文化根基与主体建构核心机制的教育而言，这一问题尤其关键，其知识生产若依附于技术逻辑与资本逻辑，国家势必将面临主体性被消解与价值扁平化的危机。当前涌现的数字殖民主义、技术殖民主义、平台殖民主义、加密殖民主义等批判性理论^[20]，为我们思考数字时代教育学知识的自主性提供了重要参照。

2 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张力中凸显中国立场

普遍性与特殊性是哲学领域的一对基本范畴，也是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必须要面对和厘清的一组命题，其间既涉及认识论层面的知识建构与理解方式，也牵涉价值论层面的教育目的与文化立场。特别是在当前推动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时代语境中，厘清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内涵和张力，已成为不可回避的理论命题。中西方语境中对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理解存在根本差异^[21]，在西方主导的知识传统中，普遍性通常被视为超越文化、历史与语境的“真理”形式，从而获得更高的理论地位。这种对普遍性的强调，实则隐含着一种知识等级制，即以西方中心的知识逻辑作为衡量他者知识合法性的尺度。这种话语逻辑在全球教育学术界广泛渗透，导致中国教育学期长期处于“用西方理论解读中国实践”的学术依附状态，进而削弱了本土教育学的主体性与独立性，使中国教育学期在国际学术界陷入举步维艰的发展困境。

在当下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中，为凸显国家主体性，学界形成了要扎根中国本土，解决中国问题，构建具有本土语境、文化意涵与时代关怀的核心议题、核心范畴和核心表达的共识。在此过

程中，突出并确立中国教育学的“特殊性”，成为突破理论话语依赖、建构知识自主性的关键路径。这一“特殊性”不仅体现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应用，还体现为对中国社会实践与教育现实的深度回应。然而，对特殊性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对普遍性的全然否定。事实上，若将普遍性完全等同于西方话语的代名词，并将其排除在中国教育学建构的理论框架之外，反而可能陷入新的封闭与狭隘。在中国传统形而上的语境中，普遍性指的是方法的性质，即道的性质的共通性。虽然不同国家在教育目标、内容与手段上存在差异，但是在数字技术影响下教育学知识生产的方式、机理、载体甚至所面临的问题都是相同的。无论是人工智能、算法决策对教育伦理的冲击，还是沉浸式技术对学习方式的重塑等，都是各个国家需要共同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在此意义上，中国教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在突出本土特殊性的基础上，回应全球教育发展面临的共性问题^[22]。

3 “物理-精神-虚拟”三重空间交织下重塑知识境域

当下人类处于物理空间、精神空间、虚拟空间三重空间之中，虚拟与现实交互，人类与机器共生，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存在样态。虚拟世界对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不断渗透与重构，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认知方式乃至存在方式。在此背景下，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要凸显人的主体性，亟须回应三重空间结构带来的现实挑战与哲学关切。

一方面，教育学知识体系的建构需主动促进物理世界与虚拟世界的深度融合。随着技术的不断演进，其在教育领域中的角色早已超越工具性层面，从早期的辅助教学设备演变为智能系统、知识伙伴乃至“拟人格化”的存在。例如，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能辅助研究者进行资料整理、文本撰写与逻辑建构，还能改变师生互动结构与知识生成机制。在某种意义上，技术已不仅是人的外部延伸，更是通过算法、感知和数据的“物质化过程”逐步融入人的身体与认知系统，成为“身体-技术联合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虚拟空间中，个体既是意义建构的主体，也是数据逻辑与编码机制的客体^[23]；“真实空间的教育与虚拟空间中的教育同样真实，两个空间共同组成人们整全的经验来源。”^[24]《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以教育数字化开辟发展新赛道，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25]。面对这一趋势，教育学不仅要在实践层面提供理论指导，更需在知识体系建构中将技术介入的教育生态、虚拟场域中的教育关系、数字教育伦理等议题纳入其学术框架。

另一方面，在高度技术化的背景下，教育学知识体系建构也需要积极挽救精神世界的失落。技术与算法逻辑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可能造成人的主体性削弱、教育的工具化倾向以及对生命意义的遮蔽。尤其是在人文学科面临大幅缩招的现实境况下，教育学亦面临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对人文传统的严峻挑战。从历史维度来看，有关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争论贯穿于教育学的发展历程中，自赫尔巴特创建科学教育学以来，科学化一直是教育学的普遍追求。期间虽也出现了以德国哲学家狄尔泰为代表的文化教育教育学，为人文科学地位的据理力争，但受科学化的影响，实证的研究方法一直占据主流。数字时代的到来进一步推动了实证方法的广泛应用，数据分析工具如 CiteSpace、SPSS、NVivo 等的出现，使教育研究的科学性与技术性得到空前加强，为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新的工具。然而，数据所捕捉的永远是现象的表层，难以承载教育的本质与主体精神性维度。如果教育学仅依赖于实证化的数据和逻辑，人类的思维将会陷入一种机器般的工具性思维^[26]，从而陷入技术的迷思，无法真正做到培养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教育学是一门研究人的学科，“人不仅是一个自然生命体，更是一个超自然的意义生命体……对人的意义生命体的把握只能通过对话、移情、体验、理解，进入人的内心世界。”^[27]在技术赋能教育实践的同时，更要以人文精神引导教育的价值方向，通过质性研究方法如民族志、现象学与扎根理论等，挖掘教育生活中的深层经

验与背后的文化意蕴，实现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的连接。这不仅是对教育本质的回归，也是教育学走向自主化、理论创新与文化自觉的重要路径。

三 数字时代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新路径

时代之势已逆不可挡，需正确看待并认识数字时代技术对教育学知识体系建构带来的巨大变化。一方面，大数据通过对海量信息的获取与分析，展现出比人类研究者更强的跨学科知识储备和运用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个体研究者的能力局限，为获取更为完整而确定的知识注入了新的可能；但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智能性”具有根本性的局限，当前的生成式模型依赖大量语料的训练与语言模式的统计分布，通过概率驱动的语词拼接完成内容生成，其本质上并不具备人类的抽象推理能力、创造性意图以及理解能力，因此并不具有生成新知的能力。如今，弱人工智能缺乏意识与“意向性”，无法真正“理解”自身所输出的内容，也不具备对其言说后果承担责任的伦理能力。因此，针对人机协同参与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知识生产主体需思考如何做好数字资源的提供者、数字技术的使用者和数字技术的控制者。

1 构建集体智能系统推动教育数字资源有效供给

人工智能参与的知识生产过程，实质上构成了一种基于知识库、规则体系与事实逻辑的“集体智能系统”，这一系统融合了信息的搜集、处理、生成、匹配与推荐等多重功能，其运作机制体现出高度集成化的技术逻辑^[28]。而知识生产的基础在于知识的聚合和结构化处理，在数字技术支持下，构建一个涵盖海量教育数据、理论成果与实践案例的大型档案库，成为推动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核心基础，以更好地服务于本土教育实践和理论创新。

其一，在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中，亟需树立一种面向未来的“互联”思维，打破学科壁垒和组织封闭，推动教育科研机构与技术研发部门之间的深度协同。通过协作开发具有自主学术立场与文化逻辑的教育理论数字资源库，不仅能够系统化积累本土教育思想成果，也为知识体系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思想支撑与媒介平台。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在数字时代到来之前，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主要依赖于具体的社会情境和物理空间，人们在对共同资源的依赖中形成了面对面的互动模式，知识的生成往往以地域性社群、制度结构与学术共同体为依托。然而，数字时代的来临改变了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基本图景，借助高度中介化的传播技术，知识的流通已不再受限于时空边界，行动者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即时联结、远程协作与知识共享^[29]。这一媒介环境的变迁，为跨学科、跨领域乃至跨文化的教育对话提供了新的可能。

其二，依托国家层面推动的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应积极推进将大规模教育实践过程转化为结构化、可计算的知识资源，构建起以“实践-技术-理论”三位一体为核心逻辑的知识生产闭环。这一闭环不仅有助于实现教育经验的系统归档与智能分析，更为教育理论的本土生成与持续演化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和方法支撑。这使多元知识形态得以通过数字形式进行存储、重组与再创造，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和全球视野的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资源保障。

2 发挥主体能动性增强人机协同知识生产效能

思维是人的本质，而人对机器的高度依附会使人的独立思考能力面临被削弱的风险。因此，把握技术的使用度，正确而有效地使用人工智能变得格外重要。

第一，应充分发挥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各自的优势，迈向人机协同的教育知识生产新范式。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大规模信息处理、内容快速生成与模式识别方面展现出强大的潜力，教育研究者应熟悉并善于使

用人工智能,使其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实现人机共强^[30]:首先,数字化、智能化的知识涌现模式,借助数据挖掘、模式识别和复杂算法等技术,能够帮助研究者高效处理大规模数据,深度挖掘其中的知识价值从而形成具有前瞻性的认知^[31]。其次,利用数字技术多节点、多层次、多形态的特点,基于教育学逻辑起点和核心概念建立知识图谱,可以将知识点有机地整合起来,从而实现体系化知识的建构。此外,数字时代“使知识传播由历时性转为共时性、由地域性演变成全球性”^[32],人类需利用数字技术,推动其承担文化翻译者与知识整合者的职能。知识是具有可靠依据并引向真实存在(所知)的判断,其所知不仅强调外部存在还包括人自身,所做出的判断不仅依靠逻辑推演还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33]。人类作为认知与反思的主体,具有逻辑推理、价值判断、情境理解和自主学习能力,这是人工智能所不具备的,通过技术的嵌入与中介,教育工作者能够从繁复的低层次信息加工中“解放出来”,将更多认知资源投入到高层次的知识重构、教育思想创新与价值导向引领之中。

第二,增强教育学知识生产主体的数字意识与跨学科素养,回应技术赋能背景下的知识建构挑战。在数字时代,教育学知识体系的自主建构不仅需要回溯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更需深刻理解技术演进所带来的认知变革与方法论重构。数字技术作为一种嵌入性极强的知识媒介,其内在复杂性和多学科交叉属性要求教育研究者具备更高水平的技术感知力、系统思维能力与跨界整合能力。

第三,建立“提问”机制,赋能教育学知识的生产与创新。知识的生产不仅依赖于信息的获取,更根植于问题的提出。在传统话语中,学问被视为生成知识的重要部分,而学问包含学习和提问两层含义。在数字时代,学会提问比获取答案更为重要,尤其是提问的方式和质量极大地影响大模型回答问题的质量^[34]。提问是认知的起点,而提问的方式、深度与方向将直接决定技术回应的质量和启发度。

3 健全技术治理机制保障知识生产质量

在数字技术深度嵌入学术生产的当下,构建具有自主性和学术韧性的知识体系,亟需从制度层面优化知识生产的标准、流程与评价机制,确保高质量的、符合伦理价值规范的教育研究成果的形成。

第一,应健全知识生产的过程管理体系,涵盖选题机制、数据采集、理论建构、同行评议等关键环节,尤其是内容标注上如何区分已有成果和机器成果引用的问题,以进一步提升学术研究的系统性与规范性。此外,还应通过不同学科的语言互动和实践反馈机制来持续优化管理流程。

第二,应改革评价制度,摒弃唯量化、唯发表的指标主义逻辑,强化对研究深度、社会价值与理论创新的综合性评估。在数字加速时代,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必须坚守“慢思维”与“深研究”的学术品格,这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论的选择,更是一种对抗知识表面化、碎片化、功利化的学术姿态,守住中国教育学的学术根性。

第三,在人工智能深度介入教育知识生产的当下,“人类价值观”与“人工智能行为准则”之间的价值对齐问题日益成为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数字技术凭借算法优势显著提升了大学知识生产的速度与规模,但同时也带来了知识产权、数据隐私、信息安全等方面的技术失控和伦理风险^[35]。所谓价值对齐,是指人工智能系统在其决策与行为过程中,能够准确理解、体现并遵循人类的伦理规范、社会价值和文化期待。在教育领域,人工智能的介入不仅是技术工具层面的应用,更关系到教育价值的传递、主体意识的生成与知识伦理的维护。要实现两者的价值对齐,需要技术层面与主体层面的双向推进。

一方面,在技术实现路径上,应有意识地通过语料投喂进行模型训练,帮助形成人类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可通过持续优化“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机制^[36],使人工智能系统在不断交互与学习的过程中更加精确地捕捉人类意图、情境语义和文化价值。

另一方面,技术路径的进步并不能替代人类在价值判定与知识筛选中的核心地位。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加持下,可能有过多“未经验证”的知识进入人类知识体系,并在算法的加持下占据更加优越的展示位置^[37]。特别是在教育领域,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往往具有高可信度外观,但其存在的潜在偏误、隐性偏见或价值冲突问题不容忽视。因此,知识生产者仍应承担“最后一道价值防线”的角色,通过严格的筛查和校验机制,对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进行事实核查、逻辑审辨与伦理审视,确保教育学知识的科学性、文化性和公共性。

参考文献

- [1]肖峰.生成式人工智能介入知识生产的功用探析——借助 ChatGPT 和“文心一言”探究数字劳动的体验[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1-10.
- [2]谭维智.知识生产新境况下的学习路向与教育新可能:对DeepSeek的教育学思考[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5,(3):10-18.
- [3]李慧慧,和学新.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中国教育学知识生产的困境及应对[J].中国教育科学(中英文),2024,(5):51-60.
- [4]靖东阁.数智时代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创新的基本逻辑与实践路径[J].电化教育研究,2024,(11):20-25、99.
- [5]杜华,顾小清.人工智能时代的知识观审思[J].中国远程教育,2022,(10):1-9、76.
- [6]李政涛.当代教育研究的视频与图像转向——兼论视频图像时代的教育理论生产[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5):1-12、159.
- [7]余杰.人工智能时代的意识形态风险及其化解[J].思想理论教育,2022,(12):84-89.
- [8]杜若岩,牛军明.数据中心化知识生产:数字时代大学知识生产的新范式[J].复旦教育论坛,2024,(5):13-20.
- [9]蓝江.生命档案化、算法治理和流众——数字时代的生命政治[J].探索与争鸣,2020,(9):105-114、159.
- [10](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著.林俊宏译.未来简史[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341-342.
- [11]曾一果,昂振.从“智人”到“数字人”:数字生命的概念嬗变与表征形态[J].传媒观察,2024,(4):63-70.
- [12]Ellul J.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4:85.
- [13]康永久.教育中的三个世界——教师知识的制度纬度及其影响[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7:59.
- [14]侯怀银,王茜.20世纪以来我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回顾与反思[J].教育科学,2023,(6):1-8.
- [15]陈文旭,徐天意.技术存在造成知识丧失——论斯蒂格勒的无产阶级化[J].山东社会科学,2021,(9):22-28.
- [16]丁钢.生成式 AI 驱动下的中国教育重构[J].探索与争鸣,2025,(3):19-22、177.
- [17]夏倩芳.建构一种积极的学术自主性——兼论学术自主性与知识体系自主性的关系[J].开放时代,2025,(2):25-40、6.
- [18]张淑.人工智能时代人类自我认识的哲学审视[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3):167-174.
- [19]李露露,王伯鲁.论马克思技术观的人学向度[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16-22.
- [20]Nothias T.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digital colonialism[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25,(13):1-13.
- [21]赵汀阳.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一个注解[J].东方学刊,2021,(1):34-35.
- [22]侯怀银,王钰捷.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路径[J].浙大教育学报,2024,(1):16-25.
- [23](意)科西莫·亚卡托著.何道宽译.数据时代可编程未来的哲学指南[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6.
- [24]赵梓含.在断裂与关联之间:技术世中的教育图景及其未来建构[J].江淮论坛,2024,(6):181-188.
- [25]中国政府网.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OL].
<https://www.gov.cn/gongbao/2025/issue_11846/202502/content_7002799.html>
- [26]蓝江.西方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的历史谱系学探赜[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1-10.

- [27]冯建军.主体教育理论: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115-121.
- [28]方师师,郑亚楠.计算知识:人工智能参与知识生产的逻辑与反思[J].新闻与写作,2018,(12):40-47.
- [29](英)尼克·库尔德利,(德)安德烈亚斯·赫普著.刘洪育译.现实的中介化建构[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169.
- [30]林松柏.人机共强:实现智能技术与教育“赛跑”的正和博弈[J].现代教育技术,2025,(1):25-33.
- [31]刘日明,刘小涛.智能知识生产模式的本质特征和社会驱动[J].社会科学,2022,(8):21-28.
- [32]杜华,孙艳超.生成式人工智能浪潮下知识观的再审视——兼论两个经典知识之间的当代回应[J].现代教育技术,2024,(1):96-106.
- [33]杨国荣.所知与能知:人类知识的多重向度[J].中国社会科学,2024,(3):166-182、206-207.
- [34]高奇琦.基于大模型的知识生产与启蒙辩证法[J].江苏社会科学,2024,(1):46-56、241-242.
- [35]杜岩岩,牛军明.数据中心化知识生产:数字时代大学知识生产的新范式[J].复旦教育论坛,2024,(5):13-20.
- [36]袁雨晴,陈昌凤.道德物化:大模型人机价值对齐的技术伦理进路[J].南京社会科学,2024,(6):88-97.
- [37]刘书文,郭晓.生成式人工智能重构人类知识生产与思维方式[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4-18(7).

New Understandings, New Propositions, and New Pathway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Pedagogy in the Digital Age

HOU Huai-Yin¹ WANG Yu-Jie²

(1.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Shanxi University, Shanxi, Taiyuan, China 030006;

2. Institute of Marxist Philosophy, Shanxi University, Shanxi, Taiyuan, China 030006)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ig data, and algorithmic technologies, knowledge production is gradually entering a digital era centered on human-machine symbiosis, data driven, and characterized by multimodal interaction. This has brought a huge impact on knowledge production, affecting the two main arteries of pedagogy, namely theory and practice. It is manifested as the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paradigm of intersubjectivity reshaping the representation of life, the fragmentation of information continually dissolving human wholeness, and the deep embedding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in educational ecosystems bringing hidden value superiority.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put forward new proposi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pedagogy in the digital age, including the ontological shift oriented by autonomy, highlighting the Chinese position in the tension between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and reshaping the knowledge domain under the interweaving of the “physical - spiritual - virtual” triple spaces.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pedagogy in the digital age, knowledge producers should act as providers of digital resources, users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controllers of these technologies. This involved building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systems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 supply of educational digital resources,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initiative of the main body to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ve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improving the technic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Keywords: digital age; Chinese pedagogy; knowledge productio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human-machine symbiosis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教育学重大课题“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发展与创新研究”(项目编号: VAA210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侯怀银, 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等, 邮箱为 huaiyin8@163.com.

收稿日期: 2025年1月5日

编辑: 小时